

知识规划视野中的大学

李海龙

摘要: 知识拥有的价值决定了各界对其的态度,也成为影响大学变革的重要因素。知识规划主要源自于人们的符号情结和系统的情结,并在大学中以学术探索和学科组织等形式展开。近代的科技革命造成了知识数量上的增加,也使得学科分裂与知识价值观的分立,不同的主体都想掌握知识规划的权力。大学正是在不同主体对规划权力的争夺中渐渐陷入了平庸,变得不再关注人性与理智。未来的大学应主动进行重新规划,恢复整体的知识观,用知识重新追求自由与理性。

关键词: 知识规划; 高等教育; 大学变革

中图分类号: G6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5)02-0083-09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5.02.009

知识的演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同时,知识又不断与高等教育发生着密切的联系,这种错综的历史关系带来的是知识规划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张力。高等教育代表着人类智识、社会等诸多活动的高级阶段,也意味着高等教育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的特征让人们在追逐知识的同时又对其性质和大学的价值不断产生着质疑,于是,“知识探索的目的何在?”、“大学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高等教育的真正朝向是什么?”在与知识的纠葛中,大学的性质也随之而发生变化。正如凡勃伦所说:“大学从富有诗意的圣经对没有信仰的唯物主义的关注,发展到亵渎神圣的现世意义,最后转向实用教育,这在文理学院的本科系部为学生做就业前的职业准备时,就会交织着这样的问题:‘个人的利益是什么?……’”^{[1](P17)}。由知识在大学中的分化、整合,再到大学中的教学和科研等学术活动,我们很难说是大学改变了知识还是知识在不断改变着大学。随着不同类型的知识不断涌入,人非但没有感受到快乐,反倒出现了自我认识的危机。当形而上学与传统宗教信仰在面对生物进化论与天体物理学的挑战时,当高等教育由传统的“自由七艺”的传授发展到现代多元巨型大学具备庞大学科体系并发挥着多种职能的时候,知识探索的意义已经和人性危机一起陷入到迷茫之中。“如果大学不想沦为以技术为主导的消费主义的追随者,使学生成为纯粹的知识消费者,或通过‘卓越’的技术权威话语把自己定性为跨国的官僚化的公司,那么大学必须重新为自己定位。不过,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在可供选择的前提下,后现代社会并没有什么新角色可以提供。”^{[2](P7)}历史中,大学曾以知识的名义为自身形塑了卓越的性格,也曾被视为民族国家复兴的精神支柱,如今大学的纯学术光环却正被染上其他的颜色。重新审视知识规划与大学的关系,也许会对我们的种种疑惑提供帮助。

一、知识规划的历史与变迁

知识规划是人们生产、选择、组织知识并确立传播方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为知识赋予不同的价值属性。知识规划既是科学行为,也是社会行为。在高等教育中,知识规划主要表现为确立研究内容与目的,知识传授以及学科组织等方面。知识规划是社会权力、利益和文化关系写照。由于人人都希望得到与知识有关的利益,需要凭借知识为人赋予种种合法身份,所以各方都对知识规划的权力窥伺已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知识规划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规划权力所决定的不仅是生产什么样的知识,而且决定了这些知识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在人们面前,知识在社会中的价值究竟有多大,何种知识有利于权力和利益的再生产。知识规划权力又决定了知识观念流变的叙事方式。“这些叙事一方面可以规定能力标准——这是叙事被讲述时所处的那个社会的标准,另一方面可以用这些标准来评价社会实现或可能实现的性能。”^{[3](P77)}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看,知识是人性的表现方式,也是构成交流的媒介。

人们对知识规划的动机主要来自于两种情结:一种是符号情结,符号是人主要的认知方式,是用于沟通的工具。卡西尔说:“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4](P35)}知识通过符号化的处理后可以形成认知经验。第二种情结来自于人类进化时追逐系统的倾向。人们倾向对事物的分类、综合来理解自然万物,这当中就有构成语言和经验,建立组织与发展序列的系统化过程。故而,人们对知识规划也是一个智能进化,增进理解与交流的阶段,系统的经验知识是展开认知的先验条件。经规划的系统知识又形成人类社会符号网络,交流才能实现。

规划决定了知识的性质和权力价值。知识传承往往是伴随规划语境而确立的,所以,对知识的探究就变成了生产、排定序列并赋予其价值的过程,“教育的目的不只是传授有关价值的知识,而且还要致力于价值本身,将理想内化为行为、感情和思想与从知识层面掌握理想同样重要。”^{[5](P56)}由此,人们对知识所附带的价值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而且希望通过知识搭建通往权力的阶梯。知识规划可以渗透价值诉求和意识形态,这一点在大学发展的历史中早有先例。即使是最为抽象的知识,通过规划行为也可以表现其社会价值,并且在大学中得以用教育的方式为自身实现合法性的延续,正如在大学出现的早期,决定何种知识可以用来教授和研究就是一种规划行为,并不是所有知识都在大学中有相同的地位。“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和盖伦的著作主导着中世纪大学,因为这些著作(先从希腊语被译成阿拉伯语,后来又从阿拉伯语被译成拉丁语)构成了中世纪课程的基础。它们规定了学科的性质和分类以及研究课程。”^{[6](P34)}知识规划所切割的序列对应着社会中的层级差异,以褒扬贬抑的情感确定了不同知识的叙事话语。知识规划是不同权力与价值观博弈的表现。

从知识规划的过程来看,实际上又有主体对知识性质的筛选、分离和重新构建。知识的性质取决于规划主体的身份、地位、价值观等因素,主体利用知识影响着外界。正如福柯所说的:“主体位处最佳的感觉距离上。这个距离的边缘限界着适当的信息种子;主体利用工具性的中介,这些中介可以改变信息的范围,改变主体对间接或直接的感知层次的位置,保证它从表面层次向深度层次的过渡,使主体在肉体内部的空间中循环流动——从明显的病症到器官,从器官到组织,最后,从组织到细胞。”^{[7](P56)}一旦知识规划变成了话语的分配,知识的流动就演变成一种话语序列和思维逻辑的建构过程,但任何规划主体不希望其他外部势力的介入来染指这个过程。所以,更进一步说,对主体地位的争夺与博弈往往比知识规划的频率更多,也决定了整个社会的权力序列和利益分配法则。原本不涉及任何私利的知识活动实际上显得已经有些庸俗。正如沃勒斯坦所嘲讽的:“我们发现自己正置身于相互谩骂的冲突中,在为控制资源和知识机构进行着不断的斗争。”^{[8](P3)}在现实中,规划行为决定着每个人的知识情感,人容易在知识思维方式相似的群体中获得认同,社会成员的行动也更容易在一个稳定的知识序列中凝聚力量。在大学中,系统的知识反映着学者们相似的群体意识,真理成为大学创造

知识的源头并一直被努力维护。最初大学主导的知识规划保持了对人性的尊重，“教育的目的之一是发掘出我们人性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在任何时代和地方都是一致的。因此，教育一个人在特定的时期和地方生活，或调整他们适应特定环境的观念，是有悖于真正的教育理念的。”^{[9](P39)}高等教育总是利用知识不断发现、启迪和传播人性的价值。知识规划为大学塑造了人性灵魂，使大学成为社会中的精神权威。

历史中，知识规划主要在中世纪大学建立前后兴起，早期知识探索以追求理性价值和人文关怀并重。学者行会将知识规划变成了一种标准化的行为，不论是研究还是教学，经过分类、整理和规划后的知识使先哲的知识气质在大学中得到了复苏，“在学术上，除了透过其教义的建立和维护，学校教义的充实和发展，调和了古希腊和古罗马在文化上的优点之外，还能在文化上启迪人类的心灵，广纳东西文化的精髓，丰富了学术探索的领域，也鼓舞了开放容忍的态度和理性探究的研究精神，这更是后来大学建立的基本立场。”^{[10](P67-P68)}在中世纪，知识规划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社会需求。古罗马法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博洛尼亚大学的诞生，神学知识在修道院的归集则为巴黎大学的出现积累了资源。早期知识规划确立了一个智识生活的体系，并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了大学的形象。“中世纪大学赋予了从古代继承下来的知识等级观念以制度形式。”^{[11](P337)}然而，知识规划的目的却并非一以贯之的流传下来，其中有出于认识论的角度来规定知识探索目标的，也有从经济论、政治论的角度来理解知识的作用。由于要面对外部的这些不同知识观，防止规划的权力被僭越。学者们的规划行为逐渐演变成社会仪式，以学位、学衔、教授席位等仪式彰显了大学的神圣，并同外界划分出属于大学的领地。“来自学校共同体的神学观念在宗教改革时期对宗教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直接影响了欧洲的政治、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分裂和这种分裂所造成的痛苦的冲突。”^{[12](P132)}大学也利用知识规划向外部社会争取了种种特权。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的是，知识从被选择、分类的那一刻起实际上走向了裂变的格局。其原因在于知识本身的开放性与规划权力的唯一性产生了矛盾。随着历史的演变，当知识走出大学的围墙，同社会的权力、利益与意识形态、价值观相接触时，就引发了种种纷争。规划不仅是一个分配合法性的过程，也是一个剥夺他者利益的过程。“话语权形成不是一个正在发展着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具有自身的活力或者自己特殊的惰性，并把它不再说的，尚未说的，或者此刻同它唱反调的东西随身带进未表达出的话语中。它不是一个丰满的和难得的胚体，它是对空白、空缺、欠缺、局限和分割的分配。”^{[7](P132)}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再严谨的知识规划都不可能将自己的权威大厦修建的滴水不漏，随着历史变迁，知识总会因人们新发现和新探索的冲击下失去光芒，创造——否定——再创造的生产逻辑更是不断循环。对大学来说，知识的重新规划带来的是心灵权威的瓦解。到了中世纪中后期，伴随着经典力学、日心说和二元论思维的出现，传统的以宗教、神性为权威的真理体系已经被撼动了。传统中确定的，不同学科原本唯一的知识话语逐渐被证伪。随着自由七艺在大学课程中被自然科学的崛起而肢解，人文气质在大学中的位置不断被消解。最初由上帝神性所主宰的知识逻辑被进化论和精密的计算数学所打破，传统的知识价值观与权威格局已经被颠覆。随着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两种文化”态度上的分途，此时的知识规划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知识的归学科”。早期知识规划中的人性基因伴随着知识主体的多元化分离了。

到了近代工业社会，专业化的知识分类和学科建制在大学中风起云涌。如果说最初的学者凭借求知欲望汇集而成的行会可以最终演变成大学的话，到了17~18世纪，学者们则随着分裂的知识被纳入到学科中。近代大学只好“主要通过哲学系内设立一系列的专业（我们现在称之为学科），大学体制才得以维持。”^{[8](P9)}学科的出现是大学自我调适知识规划的方式重新适应社会要求的体现，知识生产由最初的师徒传承向标准化、职业化与实用化进行过渡。大学也不单单是知识的象牙塔，而是变成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角色的竞技场。由于政治权力占据着至上的合法地位，其对知识生产的介入的频繁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初的宗教。当民族国家逐渐向威权国家转变后，原有的政治宗教二元结构的失衡使得政府成为了控制大学的寡头。“在高等教育领域，非理性的政治统治着专业人员和环境，

专业人员和环境又左右着各机构间的关系。”^{[13](P51)}实际上,当知识规划被纳入到国家的生态体系中时,已经有不少学者将规划权力转让与统治者实现了利益的通约,国家则利用知识使权力的运作更有效率。在工业时代到来之后,大学为了迎合社会的功利性需求,高等教育从“高深”学问开始走向世俗,学术逻辑开始被植入商品经济的思维,精确的量化运算取代了传统的哲学思辨。知识在这种规划中变得日益庸俗,知识规划的路径不再开放,更为专业的学科知识是为了职业化工作的需要。传统知识的开放逐渐走向了专业分工的闭塞,“如我们今天所知,历史和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19世纪思想的一个产物。可以肯定,编年史学有一个很长的传统,在那时之间,社会科学也有很多原型实践者,常常都是罩在哲学的条目之下。然而,法国大革命给世界系统以制度上的撞击,导致了整个系列的文化转型。其中一个产物就是社会科学作为一种专业化的活动出现了。”^{[14](P110)}在专业化学科的催生下,大学渐渐向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的知识观靠近。总之,从19世纪起,知识规划变成了国家、社会与学术的共谋行为,并为制造利益与维持稳定而生产知识。知识规划中的大学被赋予了知识生产之外的众多职能,却解构了对于人性的引领作用。

二、知识的规划与大学的危机

知识规划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随着知识生产速度的加快,新知识的种类与形式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感官。人需要凭借知识规划重新处理知识与高等教育间的关系。在现实中,知识规划是一个充满着争议的问题。这种争议表现在不论规划与否,都会对大学产生不可逆的影响。如果进行规划,势必会引来对知识话语权的争夺,对高等教育本身的资源内耗极大。反之,知识系统内又会产生混乱,知识与高等教育又无法实现对接。但在现实中,知识却以几何级数般的速度进行着增殖。大学功能的合法性在新知识的侵袭中面临着流逝的危险,“在神权崩溃之前,所有知识统归于上帝,分裂的力量小于统整的力量,因而知识得以圆融,大学得以包罗万象。然而在国家导向下,大学知识体系‘包罗万象’的合法性必须得到重新证成。”^{[15](P11)}从原因上看,工业时代中原有的知识系统在强大的外界力量的胁迫下不得不努力迎合。新的“规划”解构了大学的知识体系,威权国家迫使大学为知识确立了政治的标准。“天主教对哥白尼学术的禁锢,苏联对摩尔根遗传理论的拒斥以及臭名昭著的‘李森科事件’,我国‘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相对论持续10年的批判,都为某种不公允的‘划界标准’付出了血的代价。”^{[16](P1)}大学的整体性被分化的学科和专业取代,并扭曲了大学的知识生产方式。知识规划变成了学科分裂的等量替换并改变着大学的生态结构,大学在这种规划的“无形之手”中被重新洗牌。知识分裂所瓦解的不光是真理价值,更解构了大学的精神权威。19世纪,社会科学虽然从人文与自然科学中分化出来,但其摇摆不定的立场使得其对于大学理念的贡献力度遭到质疑,“众多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学习正日益变得支离破碎,失去了往日的中心地位;教学及学术研究中热衷于盲目推崇那些鼓吹竞争性——并且那些鼓吹通常以强势的意识形态影响强加于人们的意识之中——的特殊主义,而放弃了公正的普遍主义的制高阵地。”^{[17](P23)}在学科弥散的环境中,大学内外无法形成统一的话语渠道,学科之间为证明谁是“最科学”的而相互争斗,大学内以学科为单位的组织山峰林立,学科间貌合神离,大学更像是学科的集合体。学科按照对物质生活的贡献力被划为三六九等,而等级的划分准则是谁更能吸引更多的经济财富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分化的学科越来越偏离知识的本质,带来的是对知识理性的价值分裂。“由于社会中权威性价值体系的缺失,价值无涉(Value-free)就被认为是学术的主要原则,这一原则是模仿所谓的‘硬’科学的中立话语。结果是,社会科学不再是十分‘社会的’,人文学科也不再是‘人道的’。”^{[18](P67)}政治—经济—行政的新规训取代了知识—教育的逻辑在大学中成为新的供奉对象,课堂纪律、研究禁忌、出版规则都难以由学者自身掌控。大学不再是单纯生产知识的组织,而成了提供规训的场所。“政治上正确”和“经济获利”的目的超越了从知识到真理的研究信念。正如阿罗诺维兹所说:“已经假定大学的核心任务是生产有用的知识,这里的‘有用’指的是可以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毫无疑问地给予科学和技术学科以凌驾于旧的传统学术之上的特权。”^{[19](P30)} 企业型大学作为典范在现代社会中被推广，纳税人希望大学消耗的资源更少，提供实现欲望的机会更多。

由于人们对知识分裂有持续兴趣，造成的后果是传统的人性观在“大写”的应用学科面前显得不合时宜，基础科学的研究和学习在市场规则的压迫下不断向实用、实证的目的屈服。当然，不论目的是什么，学者们对于学科的偏爱本无可厚非，但研究者都不自觉地将这种偏好带入了高等教育，在研究与教学中给学生造成了割裂整体的思维，并伴随着他们步入社会。凡勃伦批评道：“这样的结果一点儿也不会令人惊奇，因为限定的学科范围一开始就将学生的‘注意力’垄断了，并不是根据学生资质的不同提供分门别类的教育；这就像正常发生的，尤其像在所言及的学校或系部的完全浸透了商业精神的大学竞争。”^{[1](P120)} 商业气息在课堂弥漫，选修制徘徊在僵化和随意之间，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的大学毕业生除了对本专业知识有所了解外，对专业外的知识一无所知的现状了。“教育的需要、本科生的需要和教师专业技能之间的矛盾模糊了我们的视线。课程应该满足学生的需要，教师的偏好还是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学生应该成为教师心目中的好学生，还是学生通过教育为社会谋福利？大学应该服务于学生、教师还是社会利益？当教师和学生被赋予选择自由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型大学并没有想清楚这些问题。”^{[20](P36)}

知识规划引发的是大学职能的扭曲。由于大学与政府在规划意图上的差异，导致了两者对知识规划的态度上的不同。由于自身力量的单薄，大学只能在冲击中步步退让，大学要尽可能容纳所有知识，另一面却只能为功利的知识观让出更多的通道，由此所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大学的课程数目在不断增长；但另一方面，学生真正学到的知识却并未显著增加。”^{[21](P23)} 当知识探索不再从“闲逸的好奇”为起点，而是被管理意志驱使，大学知识在系统的切割中就被划分出高低贵贱，而且知识等级的血统论色彩被不断强化。经典的人文学科无人问津，用于知识消费的课程则大行其道。“如今的结果是，学生行为的消费倾向被不断强化。……然而消费行为的两个缺点已经显著无遗：提高学生录取率的专业指导，以及争取更好奖学金的交易谈判，压倒性地偏向于更富有的家庭，而那些显然是家境不好的学生们更迫切需要的。高校越来越将学生们视为客户，而不是这项事业的参与者，或是茫茫学海上的同行者；而相应的，学生也日益将学院教育视为一种可购买的商品。”^{[22](P19-P20)} 知识与高等教育的旨趣逐渐向深渊滑落。

现代社会知识爆炸已经让传统的规划没有了用武之地，外部社会与大学在密集的知识冲击下难以相互信任。人在海量的知识面前，传统知识观早已发生离散，而知识分化与分裂的速度超越了学科分类的作用之后，实用的技术知识显然更受社会的欢迎，知识不再为启迪人性有用，而因功利性变得实用。高等教育在技术知识与职业培训的冲击下产生了种种紧张关系。“……把知识视为‘其本身目的’的通讯教育与更加实用主义的高等教育之间的紧张关系是 19 世纪论战的核心所在。这种紧张关系今天仍然存在，但在这种紧张关系之外又出现了另外两对紧张关系。第一对紧张关系存在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第二对紧张关系出现的时间还要晚些。它肇始于工业界要求其雇佣的毕业生必须拥有与职业相关的技能，这与主干课程之间形成了张力。”^{[23](P202)} 既有的课程空间实际上在被规划后的、分裂的学科体系中被压缩的十分有限。在商业社会中知识被替代的频率超过了被理解的速度。在新的规划体系中，传统的高深知识被作为商品符号，降低理解难度的同时也降低了知识的格调。“从 17 世纪起，整个符号领域分布在确实性与或然性之间；这就是说，不再有不被认识的符号，不再有沉默的标记。这不是因为人们拥有了一切可能的符号，而是因为，只有当两个早已被认识的因素之间的替换关系的可能性被人所知时，符号才能存在。”^{[24](P79)} 人看似在符号中理解了更多的知识，而实际上却再难以理解人性。

由于知识规划中要求自立门户的学科语境甚嚣尘上，导致知识规划中的原本有序的分类变成了无序的分裂。复数的学科变成了学科集合的复数。在大学中，知识规划改变了人的心灵归属感，分裂的学科塑造了分裂的价值观。正如克拉克所说的：“一个学科的统一性不仅在知识意义上，而且在机构的可信性和地位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也许正因为如此，物理学家才主张他们的‘唯一’观，以及他

们的压倒一切的‘家族情感’和他们所共享的知识风格与兴趣共鸣,而不管各专家间很少来往的事实,也不管学者社团在知识发展过程中,正在变得越来越分裂。”^{[13](P191)}以学科为单位的学术组织、期刊和会议实际上拉大了知识之间的距离,更割裂了知识的系统性特征。不同学科门类矛盾对项目资助的争夺而愈演愈烈,传统而整体的知识世界被打破为多个分化的学科世界。“就‘门类化’而言,其目的是消极的,它妨碍了对问题的整体分析以及对历史世界的辩证分析。按照这种方法,人们更加难以观察和维持世界秩序的潜在结构,因而也更加难以组织和改变它们。”^{[14](P227)}这样一来,高等教育的认识论基础随着学科的分裂而不断消散。

总之,知识规划解构了传统高等教育演变的合法性,在新的合法性未曾建立时,高等教育既有规律就会同新进入的价值观发生冲突。启蒙运动后人的放纵从而发生了知识规划的变异,个体对知识的控制力和占有欲取代了求知欲。大学知识上的整体性在一次又一次的科技与工业革命中被瓦解,大学在努力保存自己的时候不得不出让规划权力,以此为筹码换取外部信任。“高等教育理念的哲学基础与社会学基础都遭到了削弱。哲学方面,我们不能为知识探索提供任何绝对的认识论支持;在社会学方面,高等教育及其多种思想对于现代国家中占据一个独立地位已经信心尽失。”^{[23](P142)}现代社会中的知识规划已经沦落为为不断出现的知识颁布“流进大学准入证”的功能。渐渐地,在高等教育可供选择的知识范围中,学术性的,探索人类本性与真理的知识被抛弃,大学不再是智识机构,而更像是知识企业。“人们热衷于谈论用商业化方式来组织管理大学及其设备、人事、日常事务的十分必要性。……这样,大学被当作一个在博学的统帅管理之下的处理具有商品性知识的商业机构,统帅的职责在于想方设法促成最大可能的产出量。”^{[1](P103)}在这种变质的高等教育中,人才培养变成了从流水线上打包商品,大学的社会责任在变质的规划下被异化。这样的规划一次次引发了大学的危机。

三、知识重新规划的本质与大学的未来

知识规划是对大学提供变迁机制的过程。但大学不应成为被规划后的知识奴隶。为了使大学在未来社会中坚持本质,所以人们需要进行知识的重新规划。随着多样化知识生产方式在大学外迅速出现,知识已经变成了一种竞争资本,知识将会在更加频繁的规划中展现出不同的价值。知识生产被纳入到现代化的制造体系中。大学在规划语境中的价值正日益衰微。“在这样的语境中,大学和媒体即使相对于合理化的压力更加脆弱,也成为社会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的一个主要场所。那种认为高等教育构成一个冷静地寻求真理和知识的自治领域的想法,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神话。”^{[25](P5)}在大学外部,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正在悄然兴起。新知识革命的到来已经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大学的命运,未来对知识规划权力的争夺将更为激烈,由此而引发的对抗将层出不穷。未来的大学必须要在知识革命引发的对抗中保持稳定,防止知识价值观的失衡。由此,未来的知识规划应该重新由大学来掌握,大学应该找回自己主体的位置,彰显人性与理智的特征。对知识规划的恐惧只会让大学在权力与欲望的逼索下逐步退却。人们要做的不仅是要适应时代规律,而且还要在一个混乱的环境中重拾高等教育的知识信念。未来知识的重新规划需要从维护大学的本质知识观、重新彰显大学的知识价值、重塑大学的精神地位并主动进行知识规划四个层面入手。

知识观决定了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是决定规划走向的最直接的因素。大学应该塑造出自身特有的知识观。历史上,早期的知识规划目的是唯一的,大学用知识保持了对神性意志的崇敬,“中世纪的神学家对有关人与上帝、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真理应有的比例和重要性已经作出了精妙的陈述。这是从真理到真理的一种循序渐进。因为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他所能想象的最高层次的关系;因为他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上帝,他的所有真理——涉及上帝与人的真理——使得他的知识有了意义和次序。”^{[9](P56)}早期的人们所信奉的权威并没有分裂,那是因为大学持有的是完整的知识观。对大学来说,知识规划也是塑造知识观的过程。现代社会乃至未来,人将会面临更多知识观的冲击,但大学应该保持清醒的是:在未来重新规划中,什么是人需要的知识,什么又是人想要的知识。未来的人可能想

要商品化的、便捷的、能够快速消费的知识，但这些知识是企业提供的。大学应该给予人们需要的知识：那种培养德性与理性，塑造心智的知识，这是大学和高等教育所应坚守的最本质的知识观。不论何时，大学都不应忘记：“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整全的人（the whole man）。”^{[5](P58)} 未来知识的重新规划在大学中的作用并不是简单地为学生制定修读的课程，而是需要利用对知识的融会贯通来发展人性，健全智慧。使经历过高等教育的人可以利用完整的知识观去看待这个世界。大学可以展现出营利的一面，但这绝不是大学生产知识的主要目的。坚持传播无功利性的真理才是大学最应坚持的知识观。“通常，在流行的理论观念中，大学从不考虑‘促进人类知识的普及与发展’之外的任何事情，这是典型特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知识无功利性的探求已经变为现代文明的最高和最终目的。”^{[1](P87)} 大学在未来的知识重新规划中应该找回的是德性、真理与理智，未来的大学可以不进行精英教育，但需要有知识的精英气质。

在未来社会，最能展现大学价值的依然是那种有别于企业和政府的知识，那种最接近于人的知识。知识生产方式一方面增加了知识的数量，但在另一方面也扩大了知识观标准重新定义的难度。知识的重新规划意味着知识价值的改变，主体带给社会的影响也不同。过去，大学中的“教学漂移”与“研究漂移”现象分化了大学的整体知识观，一度被视为是知识规划的结果。但这种规划与其说是大学自发展开的，不如说是在政治文化、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耳濡目染之下被迫进行的。“我们恰可以论证相反的命题，在多元文化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后的30年，即使不是大多数，也有许多的学术项目已经被局限在两个套路里。一个是被学术体系的学科霸权所吸收，通过构建规则体系，形成专业协会，以及建立系、专业和高级学位课程来实现；另外一个多元文化课程及其知识工具组成‘政治场’，其指导思想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即坚持‘立场’是知识的基础，至少人文学科如此，尽管一些哲学家论证了该原则对自然科学也同样适用。”^{[19](P118)} 大学在规划中变得越来越难以像大学。公众所要求的是大学提供的智识和智慧的职能，需要大学用知识成为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独特文明机构。“……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加工厂，还是一个以传统经久不衰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复杂的机构，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以无数的方式服务于我们的社会文明；大学不仅是知识的守望者，也是价值观、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守护神；大学不只在教育于发现，也在于向现存秩序发出挑战并促其改革；”^{[26](P35)} 未来人们尊重大学的依据并不是因为大学多像企业和政府，而是因为大学能保留多少人性与真理的成分。大学不论在未来的时间里能延续多久，支撑大学前行的，恐怕还是那种最为质朴的知识信念和真理观。当后工业社会正在改变着知识规划的命运时，规划主体也在向多样性进行过渡。但是，规划主体的多样化并不意味着机构的单一化与趋同化，未来的大学可以为不同的人制定出多样的知识标准，但这同样并不意味着大学所生产的知识就应该从钻研高深学问走向传授工作技能。知识规划不是让人被知识所禁锢，而是需要用知识去追求自由。大学重新规划知识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但大学所规划知识的朝向必须是确定的。只有知识的自由价值才能昭示人的多种存在方式。

未来社会里，知识的重新规划可以拓宽大学的空间，也延续大学的时间。知识的版图不再局限于大学范围内，而是逐渐理解人与自由。大学在未来重新规划知识不再是以学科的视角来划定属性，而是需要通过规划在不同知识版图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将“两种文化”进行整合。知识的重新规划要使自然科学不再只关心实验现象，社会、人文科学也需要同其他学科通融，更加理性。大学的未来是知识融合的未来，大学应通过知识的重新规划打破学科界限，展现大学与知识的自由特质。大学在传统社会中利用知识传播真理，之所以能够被人们所认可，在于其知识价值与目的整体统一性，在于大学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正如沃勒斯坦从过往的经验中发现的，知识本来就是统一的。“在以往的世界体系下，无论人们的价值观如何，无论什么群体负责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所有的知识都被认为是一个认识论上的统一体。当然，在历史上某个特定的体系下，有可能形成许多不同的思想流派，有可能对‘真理’的内容有很多争议，但从来没人认为曾存在过截然相反的‘真理’。”^{[8](P8)} 大学需要借助这种知识的重新规划来恢复统一的真理观与大学的精神朝向。

像生物体一样，任何社会组织在进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环境的选择，大学唯有在知识的规划中主

动展现出自身的价值,才能赢得社会的认可。在新的规划革命到来之前,大学要做的不应是形式上的模仿,而是需要在多样性的竞争中展示高等教育的知识特点。未来知识规划的话语虽然可能会更加纷繁,但大学所选择的应是那种最能体现本质的规划方式。通过知识的重新规划来关注人性、理智与真理。对大学来说,知识的重新规划在于能否恢复整全的知识观。“大学的任务不仅包括生产知识,向年轻一代传授知识,还包括整合知识。”^{[20](P68)}随着时代的变迁,多元交叉学科的融合、复杂性知识观念的到来让大学必须对已有的知识结构做出革命性的调整。未来大学通过对知识重新规划最终目的是为了恢复大学的本质。新的规划逻辑将主导大学的知识命运,大学应该在保守与变革中把握自己。自教会没落后,大学就被人们视为是拥有知识和信仰的精神机构,因为大学能够不断唤起在迷失的时代中的人性、与真理的回归。批判性的思维、学术性的追求以及智识的教育活动是大学最持之以恒的合法性来源。总之,在未来,大学唯有通过对于知识的主动规划才能复兴知识气质,才能保持理性,才能追逐自由,不断面向人性,保留高深知识的本质。

参考文献

- [1] [美]索尔斯坦·凡勃伦.学与商的博弈——论美国高等教育[M].惠圣,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 [2] [英]杰勒德·德兰迪.知识社会中的大学[M].黄建如,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3]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车槿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4]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5] [美]哈佛委员会.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M].李曼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6] [美]玛格丽特·J·奥斯勒.重构世界: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自然、上帝和人类认识[M].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 [7]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 [8]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知识的不确定性[M].王昶,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 [9] [美]罗伯特·M·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M].汪利兵,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
- [10] 卢增绪.高等教育问题初探[M].台北:南宏图书有限公司,1992.
- [11] [瑞士]吕埃格.欧洲大学史[M].张斌贤,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 [12] [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M].人民教育出版社教研室,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13] [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 [14]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反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M].刘琦岩,叶萌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 [15] 鲍嵘.学问与治理——中国大学知识现代性状况报告(1949—1954)[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 [16] 陈健.科学划界——论科学与非科学及伪科学的区分[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 [17] [英]大卫·帕尔菲曼.高等教育何以为“高”——牛津导师制教学反思[M].冯青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18] 王璞.文化战争中的美国大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19] [美]斯坦利·阿罗诺维兹.知识工厂——废除企业型大学并创建真正的高等教育[M].周敬敬,郑跃平,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 [20] [美]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M].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21] [美]德里克·博克.回归大学之道: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M].侯定凯,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22] [美]弗兰克·纽曼,莱拉·科特瑞亚,杰米·斯葛瑞.高等教育的未来:浮言、现实与市场风险[M].李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23] [英]罗纳德·巴尼特.高等教育理念[M].蓝劲松,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24][法]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 莫伟民,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 [25][美]卡尔·博格斯. 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M]. 李俊,蔡海榕,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 [26][美]詹姆斯·杜德斯达. 21世纪的大学[M]. 刘彤,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刘传红)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新一届编委会会议召开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5.02.026

2015年1月24日上午,校党委副书记、《学报(社科版)》编委会副主任成金华教授在公共管理学院学术会议厅主持召开了《学报(社科版)》校内编委会会议,校党委书记、编委会主任郝翔教授,校党委副书记傅安洲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王泽龙教授,以及校内编委会委员、期刊社、财务处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听取了《学报(社科版)》主编刘传红所作的2014年工作汇报和2015年工作设想。会议一致认为,进入教育部第二批“名栏工程”、成为《资源环境研究》网刊牵头单位、教育部“名栏工程”联络中心落户地大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充分表明了《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科版)》在学术界和期刊界的影响力。对《学报(社科版)》为学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尤其是在学术新人培育上做出的贡献,与会编委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校党委书记、编委会主任郝翔发表了重要讲话,就如何克服发展瓶颈,如何充分发挥《学报(社科版)》在学校“学术卓越计划”中的角色、功能,如何进一步提高水平,走特色化、国际化之路,以及栏目设置、版式设计等提出了要求。他指出,《学报(社科版)》是学校的名片,是地大学者与国内外学界交流的重要平台;“资源环境研究”栏目作为教育部名栏,责任更为重大,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建设力度,提高选题策划水平。

本次编委会会议,是以郝翔教授为编委会主任的新一届编委会成立一年来的首次编委会会议。考虑到年关岁末工作繁忙,加上交通不便,本次会议没有邀请校外编委亲临学校指导。

(朱蓓供稿)